

海阳大秧歌舞动盐城欧风花街。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

今年3月,在苏州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,海阳大秧歌节目《老少爷们扭起来》摘得山花奖,这是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项。作为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阳大秧歌,再次轰动全国民间文艺界,名震四方。

如今,在一年四季的节假日里,在各种活动庆典上,在高雅的艺术殿堂和广袤的民间舞台上,山东大秧歌越来越火了。它火遍城乡,火遍街头,火遍东西南北。

那激越的鼓点,震得人心里乱颤;那扭动的身姿,看得人眼花缭乱;那热情的观众,挤得人东倒西歪;那热烈的场面,引得人兴奋不已。表演者和观众都沉醉在这欢乐的海洋中,醉在这听不够、看不够、回味不够的乡音乡情中。

山东的大秧歌里,有山川原野、河流池塘、土地庄稼、农舍炊烟、鸡鸣牛羊、粮食瓜果,能闻到土地的芬芳,看到草木的葱茏,听到虫鸟的鸣叫,尝到果实香甜……

热闹、喜庆、希望在震得天响地颤的秧歌中达到了高潮。

(一)

齐鲁大地有三大秧歌流派闻名遐迩、享誉四方,分别是热烈火爆的商河鼓子秧歌、粗犷奔放的海阳秧歌、柔美俏丽的胶州秧歌。

商河鼓子秧歌的艺术形态有着鲁文化的渊源特征,体现着祭天敬神的功能特性,是齐鲁大地上的“雄浑之舞”。“鼓”为核心道具,“伞”是鼓的引导,“棒”“花”“丑”则是陪衬烘托。男性舞者身着武士装束,手持鼓槌,舞步沉稳有力,鼓点密集急促,如千军万马奔腾,透着豪爽与刚毅;女性舞者以轻盈的步伐、柔美的姿态、如花的笑容和灵动的手帕舞动,为整个表演增添了一抹温婉与秀丽。队伍表演时常用“缠、绕、拧、转”的技巧,具有“稳、沉、神、韧”的艺术特征,大方、豪放、阳刚、沉稳。其队形变幻莫测,既有“单队穿插”的灵动,也有“方阵推进”的磅礴,展现出高度的默契和团队协作精神。

海阳秧歌礼仪古朴,阵势庄重,结构严谨,声势浩大,既有气势恢宏的“大架子”秧歌,也有诙谐风趣的“小架子”秧歌,有着宫廷的“礼”与民间的“俗”相结合的特征。秧歌队阵容强大,由三个部分组成。一是执事部分,由三眼鼓、彩旗、香盘、大锣组成,排在队伍最前列;二是乐队,“乐大夫”左手抱伞,右手执甩子,是舞队的总指挥,器乐队有大鼓、大锣、大钹、小钹、堂锣等;三是舞队,由各类角色几十人组成,有集体表演者“花鼓”“阳刚”“沉”等,有双人表演者俊郎与翠花、箍漏匠与王大娘、丑婆与傻小子等。表演过程有七个部分。一是拜进,表示秧歌队进村、进场;二是串街,走街串巷行

自信乐观的“扭”,潇洒飘逸的“摇”,如风戏柳的“摆”等。演员调动全身气息动作,“踩在板上、扭在腰上、功在腿上、艺在手上、情在脸上”,讲究“稳中浪、浪中俏、俏中艮”,把天地所孕育的“人性、神性、灵性”和“土气、野气、豪气、仙气”聚在一起,展现生活活虎、春风拂面、直抒胸臆、酣畅淋漓、高昂向上的精气神。

秧歌的恢宏气势和礼仪风尚,在于秧歌队盛大的规模和队形变换的场面阵式,俗称“跑场”。人数众多的方阵队列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方阵队形如行云流水般排列组合,展现丰富多彩、严谨有序、吉祥如意、复杂纷繁的图案,阐释着古朴庄重、严谨有度、和谐统一、变化多端的整体风貌秩序。上场人数一般是“双数”,取“成双成对”之意,队形为“轴对称”或“中心对称”,体现传统美学意识。

鼓子秧歌的队形图案有石榴花、双葫芦、鸳鸯图、鲤鱼跳龙门等近百种;海阳秧歌队形变化以气势大、动势大、场面大而著称,有“四门斗”“叉心斗”“八卦斗”“龙摆尾”等20多种,以向心性的单线“圆”形运动为主,在大圆和小圆的千变万化的流动中,还穿插对角的流动,称为“拜圆仪式”;胶州秧歌队形有“十字梅”“四门斗”“两扇门”“大交叉”等10多种。三大秧歌方阵“始于圆场,终于方场”,体现出《易经》中“圆图法天,方图法地”的“天地同和”生命观。

秧歌音乐伴奏,由打击乐和吹打乐相配合,大鼓、大钹、铙钹、大锣、小锣、手鼓、棒槌、唢呐齐上阵,以锣鼓为魂,节奏为脉,快慢有序,时而急促如暴雨,时而舒缓如清风,与舞蹈动作、队形变换完美契合。演员们严格遵循鼓点定位,起舞,节奏与动作融为一体,形成了“以鼓领舞、以舞合鼓”的表演模式。

秧歌说唱是融民歌、说唱、戏曲于一体的民间小戏。方言演唱质朴通俗、乡土气息浓郁,是百姓喜闻乐见的“乡土歌谣”。演员边走边唱,即兴编词,多为恭贺祝福、吉利喜庆的“四六句子”,涵盖生活百态、民间故事、历史传说、伦理道德等诸多内容,见人唱人、见物唱物,灵活多变,尽显智慧与才情。

秧歌的服饰与道具色彩鲜明、造型独特、寓意深刻,既贴合角色身份,又饱含民俗寓意,与舞蹈、唱腔完美融合,构成了形神兼备的艺术美感。服饰以红、黄、绿、蓝为主色调,搭配刺绣、云纹、花边等,既彰显角色性格,又蕴含祈福纳祥的民俗寓意。

伞是秧歌队伍的核心标志,造型模仿古代帝王仪仗,象征“遮风避雨”“庇护一方”,寓意驱邪纳福、保佑风调雨顺。领队者称为“伞头”,通过伞的摆动指挥队伍变换队形,被认为能“搅动天地灵气”。

扇子寓意生命与活力,舞者手持彩扇,扇面开合如

山东秧歌扭起来

□戴发利

进,展示阵容;三是走大阵,在空地上围起场子开辟表演空间;四是要小场,所有角色分头表演;五是跑阵势,各种队形变化表演;六是演场,即表演“煞板收势”;七是拜出,表示秧歌队表演后与村子告别。整个表演过程程序严谨,注重礼仪,内容丰富,气氛热烈。秧歌舞蹈动作的突出特点是“跑扭结合”,舞者在奔跑中扭动,女性扭腰挽扇,上步抖肩,男性颠步晃头、挥臂换扇。“箍漏匠与王大娘”是海阳大秧歌表演中非常受欢迎的一对角色。民间传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所变,她幻化为村妇寄居在王家庄。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的化身,受玉皇大帝之命,到凡间敦促王大娘归天。箍漏匠诙谐幽默,王大娘则风流泼野,他们上演了一场男欢女爱、激烈对舞的嬉戏场面。

胶州秧歌具有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,表演有五个行当——“鼓子”是老头形象,“棒槌”则像戏曲中的小生、武生角色,“翠花”是青衣扮相,“扇女”是花旦扮相,“小嫚”是小姑娘扮相。翠花、扇女、小嫚三个角色占主导地位,动作细腻、表情丰富,通过身体的扭曲和摆动,形成优美的弧线造型,柔韧绵长、活泛灵巧、舒展利落,将女性的温柔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,被形容为“抬重、落轻、走飘,活动起来三道弯、扭断腰”。

三大秧歌需要众多舞者密切配合,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次节奏变化,每一次队形转换,舞者们都心领神会、协调一致,齐心协力呈现出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。

(二)

秧歌集歌、舞、乐、技、戏于一体,以恣肆、不羁、热烈、鲜活姿态,诉说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悲欢、家国情怀、民俗风情、观念信仰,成为铭刻在基因里的文化印记。

秧歌源自农耕文明田间地头,是农民在劳作中创作的民间歌谣,逐渐融入舞蹈、音乐,演变而成的艺术形式。农闲时节,人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、舒展身心、欢乐互动,形成了秧歌表演。

秧歌还来自民俗祭祀,体现着祈神禳灾的信仰仪式。人们以虔诚、庄重、尊崇、膜拜的方式祷告天地神灵、五谷丰登,以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人畜平安,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景。

秧歌的舞蹈动作以生活为灵感,寓意万千——有田间劳作、有万物生长、有日月轮回、有风霜雨雪、有长幼互爱、有姻缘情愫、有和睦团圆、有善恶回报,在步伐技巧、肢体语言、面部表情的演绎下,既有刚劲威武、粗犷豪迈,又有灵动婀娜、柔情万种;既有规范严谨、合群服从,又有任性发挥、自由放纵,一招一式都饱含力量与美感。

秧歌有一套独特的“走、扭、摆、摆”的步法,如仙踏云的“走”,

花朵绽放,象征大地回春、万物勃发。扇子的上下翻飞动作也被视为“驱赶晦气”的仪式。女性舞者执扇,其柔美舞姿和扇的飘逸与男性的阳刚之气配合,寓意“男耕女织”的协作关系。扇面图案(如牡丹、蝴蝶等)则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伞还象征人们对雨水的渴望,扇则模仿风吹麦浪的景象。伞与扇的组合构成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,构成一幅生动的农耕祈福画卷。

花鼓也是秧歌的常用道具之一。舞者手持花鼓,通过不同的击打方式和节奏变化,配合身体的扭动和跳跃,营造出热烈而欢快的氛围。特技动作如抛鼓、转鼓等,增加了表演的观赏性和趣味性。

踩高跷是秧歌中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的表演形式,演员需具备良好的平衡能力和身体协调性,掌握较高的舞蹈技巧和表演经验。表演内容丰富多彩,既有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动作,如猴子摘桃、仙鹤展翅等,也有表现生活场景的情节,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。

(三)

在民间,无秧歌不过节。在春节、元宵节、二月二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传统节日,秧歌是必不可少的庆祝形式。尤其是春节至元宵节期间,一直延续到二月二,各村秧歌队通过“串村”活动,相互交流、切磋技艺、互表友好、联络感情、化解矛盾。秧歌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和交流,通过即兴表演、互动游戏等形式,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。在农闲时节,村民们聚在一起,学秧歌、唱秧歌、跳秧歌,没有严苛的技艺门槛,男女老少皆可参与,自娱自乐。

秧歌彰显着地域独特的审美情趣、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念,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。游子无论身在何方,听到家乡秧歌鼓点、唱腔,便心生归属感。

秧歌的传承,离不开坚守初心的乡土艺人。一代代民间艺人言传身教、默默坚守,将一生奉献给这门艺术,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。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、丰厚的收入,却有着最纯粹的爱,让秧歌技艺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老百姓说得好:“听见锣鼓点儿,摆下筷子搁下碗儿;听着秧歌唱,手中活落放一放;听着秧歌扭,豁上老命歇一歇。”秧歌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,从宫廷遗韵到民间农耕文化,从民俗祭祀到红色传承,见证了乡上的历史变迁、社会发展、民俗演变,是研究农耕文明、民间

信、民俗文化的活化石,是鲜活的历史实物资料。

马年正月里的元宵佳节,海阳大秧歌队伍又远赴浙江桐庐,受邀参加“天南海北龙狮会,浙江桐庐闹元宵”活动,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澳高空狮子、中门布龙、父子山竹马、英歌舞、舞狮顶缸、特技高跷、梅花桩舞、揭阳青狮等轮番登场表演。祖国大江南北,在秧歌高潮的渲染下,度过了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。

秧歌属于历史,属于时代,但归根结底属于老百姓。它是老百姓创造的,主角是老百姓,演的是老百姓,观众是老百姓,让它永远传承、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也是老百姓。秧歌,只有永远捧在老百姓的手心里才能常担常新、永葆生机、永续发展、永放光芒。



传统节日里,秧歌是必不可缺的庆祝形式。YMG全媒体记者 柴向阳 摄



海阳大秧歌表演。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



海阳大秧歌表演。YMG全媒体记者 柴向阳 摄



姜桂进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。李滢 摄

从栖霞西南海拔400多米的岗山东侧一直往北,是一片起伏蜿蜒的丘陵。在这些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的山丘之间,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。沿沟侧弯曲的乡村山路上行三五里,始有人烟,依次为李家沟(原名李家庄)、喇叭沟、安乐庄,彼此间隔二里或三五里不等。这里是栖霞900多个村庄中非常普通的几个村子。如果没有85年前那个春天,那些叫花子似的“铁匠”悄无声息地到来,恐怕至今也没人会记起这些村子的名字。这些“铁匠”不是别人,正是刚刚诞生不到两年的胶东兵工二厂的工人。

胶东兵工二厂是怎么来到喇叭沟的呢?2009年出版的《胶东兵工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:胶东兵工二厂诞生于1939年7月,由山纵第五支队兵工厂抽调10多名技术骨干,以西海岸军区修械所为基础组建而成。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,全厂只有两台小车床、三台手扳压力机、锉刀、手锤、老虎钳子等都是主要工具。在一无设备、二缺原材料的条件下,工人们很快就制出了简易化铁炉、手摇钻、工模具,还试制成功了地雷、手榴弹。1939年11月,在日伪军的冬季“扫荡”中,第二兵工厂遭到破坏,由掖县连儿一带迁至招远县塔山院家村,突击恢复生产。1941年2月,因驻地形势紧张,第二兵工厂奉命迁到栖霞县的喇叭沟、安乐庄、李家庄一带。在驻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,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。

喇叭沟位于三个村子的中间,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村子。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交通,我们沿蓬水线绕道邻县招远地界,从正西方向直接进村。

5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滕春生,放下手里的营生,带我们在村里转悠,帮我们寻访一些知道情况的老人。然而往事经年,那段记忆已很少有人知晓。他边走边推算:1941年出生的他今年85岁了,而能记住那一年发生的事的人,如今至少应该90岁往上了。

喇叭沟年龄最大的村民,是82岁的姜桂进老人。他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曾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。如今他仍发挥余热,任森林防火巡查员。“兵工厂来喇叭沟那年我还没出生,那些事没人能说清楚。我们所知道的一点半滴,都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来的。”姜桂进黑红的脸膛在阳光下闪着光。他指着眼前的小河和旁边那座山说:“西河过去不是现在的样子,很窄,就是一条沟。河两边自然生长着一些野树和杂草,没有浆砌。河西有座不高的小土丘,村里人叫它西山。山脚下的河岸边没有人家,横七竖八地堆着几堆草垛。兵工厂来了以后,就靠着西山根的北边,一直向西建了一排草房子,所有生产车间就设在那里,伙房和宿舍在村子里面。”

其实兵工厂只在喇叭沟住了短短6个月就撤离了这里。撤离的原因,是一场日军的突袭。那是1941年腊月某天的凌晨,一场大雪将整个山村装扮得如同一个童话世界,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、美好。谁也没想到,一场灾难正悄然向这里袭来。

“天还没亮,鬼子已在西山埋伏好了,机枪就架在西山顶上。枪声一响,村里就乱了。村民和兵工厂的工人开始往东山跑。可天黑看不见路,雪又厚,找不到路,也跑不动。俺村的姜姜没跑几步,就被敌人发现。日本用刺刀

从栖霞西南海拔400多米的岗山东侧一直往北,是一片起伏蜿蜒的丘陵。在这些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的山丘之间,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。沿沟侧弯曲的乡村山路上行三五里,始有人烟,依次为李家沟(原名李家庄)、喇叭沟、安乐庄,彼此间隔二里或三五里不等。这里是栖霞900多个村庄中非常普通的几个村子。如果没有85年前那个春天,那些叫花子似的“铁匠”悄无声息地到来,恐怕至今也没人会记起这些村子的名字。这些“铁匠”不是别人,正是刚刚诞生不到两年的胶东兵工二厂的工人。

日本鬼子走时,把兵工厂的厂房和村里的房子一把火点燃了。同时点着的还有河西岸的草垛,兵工厂藏在草垛里的硝磺被火一烧都化了,流了一河。遭殃的还有村里的那盘老碾,也被鬼子炸毁了。姜桂进指着村旁河边一块半圆形的石头说:“那就是被日本人炸毁的半盘碾盘。砌河道的时候,有人说砌到河里可后来还是留了下来,做个见证。”

告别姜桂进,我们从河西岸回到了村子里。滕春生说:“我带你们去看看兵工厂的宿舍。”在村后靠河边的一处仍残留着残垣断壁的两间旧屋前,他停下告诉我们,这就是当年村里最好的房子“北瓦房”,当初有5间正房、三四间厢房,现在因街道拓宽,只剩下这一点了。看着眼前破败的一切,我们真不敢相信,当年那么多兵工战士就挤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。滕春生说:“一个院落要睡三五十人,全是打地铺,一个挤一个,条件艰苦,太不容易了!”

喇叭沟是个小山村,过去不足百户,现在也不到200户。村子南北长,东边的房子已经盖到了山根下。在村子靠北的一条宽阔街市上,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拿着板凳、马扎子坐在一起晒太阳聊天。许多人对兵工厂的事都是一知半解,可说起那次日军的突袭,他们却都能说上几句。79岁的姜振举的堂叔姜爱令被鬼子打死,家里没了顶梁柱,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,几天吃不下饭。而他的大伯姜同令却幸运得多——鬼子的子弹从他系在腰间的长布腰带穿过,人却没受半点伤。眼看鬼子追了上来,他顺势躺下装死,才逃过一劫。

69岁的姜振龙算是这些聊天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,说话不紧不慢。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中,我才知道喇叭沟这个村有些不简单,村名竟然是朝廷赐的。喇叭沟一带有个风俗:婚丧嫁娶都要吹喇叭,因此村村都有一支吹手队伍。过去喇叭沟村前的那条河里长满芦苇,芦苇是做喇叭哨子必需的材料,所以四周村里的人都到喇叭沟来采芦苇。每到芦苇成熟的时候,喇叭哨此起彼伏。有一年朝廷官员经过这里,看到一片祥和的氛围,非常高兴,便赐名“喇叭沟”。从此以后,喇叭沟名声远扬。

喇叭沟的穷,则是从那场屠杀开始的。姜振龙的父亲姜武令,是那场浩劫的亲历者,也是受害者。那天日本兵临走时,拉走了村里仅有的十多头骡子,二十多头毛驴,然后一把火把河西岸的草垛点着了。看着眼前的熊熊烈火,还有远处那些被拉走的骡子和驴,村民的心都碎了。

村民们含泪埋葬了遇难的兵工和乡亲,心里空落落的。喇叭沟建村几百年来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灭顶之灾,全村人都吃不下饭。他们聚到当时的村长姜忠进家里,一肚子话却不知从何说起,有人委屈地放声痛哭起来。姜忠进说:“哭也没用。咱得想想办法把牲口要回来呀,要不明年咱还怎么过?”经过商议,村民们东拼西凑了几个钱,请人到招远陈家的鬼子据点去把被抢走的骡子赎回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没想到凑起来的钱在半路上被劫劫一空,不但骡子和驴没赎回来,钱也打了水漂。说到这里,姜振龙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
兵工厂虽然只在喇叭沟住了短短6个月,却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滕春生带我们来到了他的姑姑滕淑花家里。滕淑花的娘家就是喇叭沟。她家后面的房子,曾是兵工厂的伙房。伙房师傅伙房师傅看村里的妇女做的烙饼很好吃,就想试着做一下,可是面和好了,油却怎么也揉不进去,于是去请教王桂美。王桂美就手把手地教伙房师傅做烙饼。鬼子突袭兵工厂那天,厂长王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,又买不到治眼病的药。王桂美就用鸡蛋清给王厂长洗眼睛,五六天后,王厂长的眼睛竟然好了。

村民们的付出与牺牲,兵工厂的人始终没有忘记。1994年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浙江宁波来到喇叭沟。他叫刘玉坤,当年是兵工二厂的一兵,在这里得到过村民们的关心与照顾。他回来,就是想再看看当年的老房东和老恩人。他给村里人带来了茶叶,还给村民们照相。在村民的陪同下,他去当年牺牲的烈士墓前进行了祭扫。与群众交谈时,刘玉坤讲到了那次突袭,是两位老人救了他的命。原来那天早晨,刘玉坤和所有人一样,踏着厚厚的积雪往东山上跑。等听不到鬼子的枪声,看不到鬼子身影时,他一头倒在了深深的雪窝里。后来,他被塔山村的老两口发现并救回了家。那时他的鞋子早不知啥时候跑丢了,脚上布满血口子,两只脚已失去了知觉。老两口把他抱到炕头上,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,喂他热乎乎的热饭,他才捡回一条命。这次回来,他特意去了一次塔山村,可惜两位老人早已离开了人世。刘玉坤说,这是他最大的遗憾。

从喇叭沟一路返回,沿笔直的乡村公路一直往南,过李家沟后,墓地有一处公墓映入眼帘。那是李家沟抗日烈士公墓。这里安葬着李家沟战役中英牺牲的70多位烈士。在其旁边还立一块墓碑,上书“喇叭沟迁此的四位兵工厂牺牲的烈士墓”。这四位烈士,就是1941年腊月日军突袭兵工厂中牺牲的兵工战士。他们原来安葬在喇叭沟旁的西山上,后来统一迁往李家沟烈士公墓。令我们费解的是,这里安葬着四位烈士,而从人们的回忆和史料记载中,我们却只知道三位烈士的名字:宣传干事胡金芳、引信组长许敬芝、制药工人张秀花。这第四位烈士成了一个永远难解开的谜。

喇叭沟的枪声

□林新忠